

後鄧小平時期中國大陸政局發展之研析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教官 史達宏

摘 要

中共「新華社」於二月廿日清晨二時四十一分正式公佈鄧小平於二月十九日廿一時零八分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三歲。此一死訊的發佈，不但結束了長期以來國內外媒體對鄧小平健康情形及生死的諸多臆測，同時亦為中共政局帶來深遠的影響。

當然世人最關切的問題是鄧小平遺留下來的「政治遺產」由誰來接班，現階段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領導階層確能掌控權力之穩定性，或是做必要之調整以達內部權力平衡，如此後鄧時期大陸情勢發展必牽動兩岸政局之影響。

今年中共有兩大政治任務必須完成。一為是七月一日中共對香港行使主權；其次是下半年即將召開「十五大」，正式完成第三代領導集團的政治接班。因此，如何維持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穩定與持續經濟發展，營造後鄧時期有利的局面實為考驗其領導人之智慧。然而在這變動的過程中，其發展情形並非如此順暢，我們或許從其政治情勢的走向、經濟之發展、軍隊之動向、外交政策之取向與未來兩岸關係之發展中窺知一二，以做為爾後我大陸政策之參考。

可以預知的，短期間大陸政局可能沒有太大變化，然長期之下或許有驚人之發展，其變動之格局尤在「十五大」之後人事的安排，深值吾

人觀察。後鄧時期如果新的領導階層不能有所新作為，以及從事政經改革之發展，深信在其未來制度化與法制化的社會中，大陸政情發展難有新的格局。綜括來說，兩岸最高領導人須以大智慧，排除萬難重開協商大門，在相互尊重下，營造新契機。

要 點

一、和平、民主、統一、繁榮、富強是中華民族之共同願望，也是中華民族之共同利益。兩岸同胞應共同努力，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事業而奮鬥。

二、兩岸關係的發展應以和平為前提，以對話為基礎，以互信為保證，以合作為目的。雙方應加強溝通，增進了解，消除誤解，擴大合作。

三、兩岸應共同維護中華民族的團結和利益，反對任何分裂國家的行徑。雙方應加強在經濟、文化、教育、科技等領域的合作，共同促進中華民族的繁榮和發展。

四、兩岸應共同維護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反對任何損害亞太地區和平與穩定的行徑。雙方應加強在國際事務中的合作，共同維護亞太地區的繁榮和發展。

五、兩岸應共同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反對任何損害世界和平與穩定的行徑。雙方應加強在國際事務中的合作，共同維護世界的和平與穩定。

An Analysis of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Mainland China in the Post-Deng Era

SHIH Hong-Ta, Military Instructor

National Taiwan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Abstract

On the morning of February 20, 1997, at 2:40, the "Shin Hua" agenc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nounced officially that Premier Deng Hsio-Ping age 93 had died. This message of his death at 21:08 the previous day not only ended the suspicions about Deng's health,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but also had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al situation.

There is no doubt that people are much concerned about the problem of who will succeed the "political legacy" left by Deng. Of particular concern is whether Jiang Zemin's leadership can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his power, or will some adjustments be needed to keep the inner balance of power. Because of this, the situation of the post-Deng era could influence cross-strait politics.

This year (1997), the Chinese Communists must accomplish two major political tasks. One is to take over the sovereignty of Hong Kong; the other is the opening of the 15th People's Congress which will formally accomplish the political transition of the leadership power. How to maintain the stabi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s reform will depend on the wisdom of that leadership. However,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the process of change does not go smoothly. It may be observed from the on-going political situation, the economic progress, the tendency of the military, the diplomatic policy, and the devel-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and policy.

Mainland China will not change much in a short time, but it will progress dramatically in the long term. If the new leadership emerging from the 15th People's Congress can not have a more open policy than before, and continue the reform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 it is assured that in the near future the Mainland's situation can hardly build a new structure of society based on law. The post-Deng era can bring new opportunity with mutual respect should political leaders on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 reopen the gate of negotiation.

壹、前言

自從毛澤東於一九七六年去見馬克思之後，國際上時而不斷傳出小平去逝之消息，何以鄧氏的死亡有如此之重要性。在確定其死亡消息傳出後，國內外媒體大肆報導下，世人最關心的事，可能是今後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外交、軍事各方面情勢及兩岸關係發展之情勢。鄧小平「治國有功」，不啻也為自己在歷史評價上有所提升，同時選擇江澤民做為「第三代領導的集體核心」可算是鄧小平的遺言（註1），及最大遺產。因此鄧小平的死，大家難免對他的身後變化十分關切，由於每個國家自己的立足點不同，其關切的問題可能有所不同，不過一般而言大家關切的模式十分相似，首先是新領導班子必定是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集體領導模式，而非江一人所能全面壟斷的局面。所謂集體領導一般說來穩定性高，然而在權力與利益的分配上則勢必要作某種程度的讓步與妥協。如此，要探究後鄧時期的大陸情勢發展，可縝密觀察中共未來將召開的「十五大」及「九屆人大」上對人事的安排。

具體而言，毛澤東和鄧小平屬於中共第一代的領導人，位高權重，在世時無人敢撻其鋒。後鄧小平時期中共的領導人，多屬第二代與第三代的政治人物，他們沒有老一代革命領袖的顯赫身世，連帶使人臆測後鄧時期中國大陸是否會出現動亂的問題。學者何漢理(Harry Harding)經多年觀察，將大陸情勢歸納為中央派系關係、軍民關係、中央與地方關係和國家與社會關係第四大關係（註2），同時，亦有許多觀察家自另一方面著眼，認為在短期間，中國大陸應不致有動亂，然也有部分人士認為三、五年後，中國大陸可能走上右翼集體、軍人專政、或稱左翼保守集權式的政權。個人以為當前中國大陸如何維持經濟持續、穩定與繁榮發展，並營造較為寬鬆的經濟格局，短期內中國大陸應該沒有出大

規模動亂的條件。因此，後鄧時期大陸情勢的可能變化，除繼續深化改革開放路線外，應會更加全方位地向國際社會開放。至於大眾最關心的兩岸問題，俟中共今年七月一日收回香港及「十五大」以後，未來中共極有可能在臺政策上會有所作為，此一現象，仍待繼續觀察。

本文首先探討大陸政治情勢的走向，繼而研究經濟的發展，軍隊的動向，外交政策的取向與未來兩岸關係之發展，最後則提出評估與展望。

貳、政治情勢之走向

鄧小平的死亡不但正式結束了中共黨史上強人統治的時代，也使中共歷史發展已進入後鄧小平時期。基本而言，「小平之後」，即使不是「太平」，也應該可以繼續維持著「小平中興」的局面（註3）。然而以目前大陸情勢來看，江澤民或江核心能獲得低度穩定是沒有疑義的（註4），從中、長期來看，江澤民在於如何實現其調和穩定的能力；以成為江核心不可或缺的領導，對「江核心」而言在於如何更有效地執行「改革、開放」政策使「江核心」的領導無可取代轉為受人擁護的領導。是以江政權的穩定大體上是人們可以期望的，因此政策的一致，大體而言也是可以預期。然而任何政策都必須隨著客觀形勢的發展，逐步調整甚至改弦易轍，只要調整的更有利於繼承者的穩定，則政策的變化是完全可能，而且也是必然的（註5）。大體而言，江核心之政權理應無戲劇性變化，然而不應該，也不能認為是完全沒有改變，如改革派與保守派長期在意識型態上之爭論，能否取得共識，權力分配與派系勢力的消長與更迭便主導了中共政治格局。

鄧小平在一九八七年召開的中共第十三屆黨代表大會中，辭去了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常務委員的職務，以便陳雲、李先念、彭真等人順利退下，進入中顧委，同時，修改黨章第二十一條第五款，廢除黨中

央軍委必須由政治局常委擔任的規定，以一介黨員身份，兼黨中央軍委主席職務。十三屆一中全會後，大會發言人稱鄧小平仍是中共的「最高設計師」（註6），趙紫陽於會後的首次記者招待會中，更明言今後遇有重大問題，一定要向鄧小平「請示」（註7）。鄧小平作為「黨和國家重大問題決策人」的地位和黨的政策「總設計師」的地位於焉底定（註8）。按中共的說法江澤民是第三代集體領導的核心，因此一核心是從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之後；江澤民才在第三代領導人中間開始突出，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的十三屆四中全會選舉江澤民為總書記，而且補選江澤民、宋平、李瑞環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這是江澤民被提拔的第一個職位，到了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再召開十三屆五中全會又通過江澤民繼鄧小平出任中央軍委主席，這是江澤民作為第三代領導的核心形勢，已經明朗，到了一九九二年十月中共召開黨的「十四大」，也再次確立了總書記、軍委主席的職位，不過政治局的常委有了小幅度的變化，常委增加為七人，他們是江澤民、李鵬、喬石、李瑞環、劉華清、朱鎔基、胡錦濤。到了一九九三年三月中共政權召開第八次全國「人大」，江澤民再從楊尚昆手中接過國家主席的職位，中共的第二代可以說完成了黨政軍的全面交班（註9）。

基本上，從權力轉移而言，中共「十四大」已確立的集體領導班子將繼續按照中共「黨章」的規定，採取集體領導、集體議政、集體決策、集體負責，並進行任務分工。目前世界各國所關切的是，在進行集體領導的過程中，他們之間會不會發生激烈的或是溫和的權力鬥爭。從九月舉行的中共「十五大」會議後，中共中央集體領導班子已有了溫和的或有限度的權力鬥爭（與毛死後逮捕「四人幫」的情形相比）主要理由包括下列四個（註10）：

一、黨內鬥爭不斷

在毛澤東統治時代，毛先後鬥垮高崗、饒漱石、彭德懷、劉少奇、鄧小平、林彪等人。在鄧小平的統治時代，鄧先後整肅了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等人。可以說在中共黨史上，幾乎每五年有一次小規模的權力鬥爭，每十年有一次大規模的權力鬥爭。換言之，短期內，中共中央集體領導班子在危機意識的影響下，可能會暫時團結一致，以維護他們共同的既得利益及中共的統治地位。長期內，因為受到列寧主義黨體制及黨內鬥爭的惡性循環規律的影響，集體領導班子可能會發生有限度的權力鬥爭。亦即受到「安全困境」意識的影響，參與權力鬥爭的各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會基於自身安全的考量，設法加強自己的力量。而任何加強自己的力量的行為則會使別人更加不安全。也就是說，個別領導人基於自衛或爭奪最高領導權的意圖，有可能積極捲入黨內鬥爭。最終如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所說：「一個派系或許能暫時凌駕於其他競爭派系上，但其權力將無法大到足以徹底的消滅其他派系，而掌握著永遠佔有優勢的局面。」(註11)

二、權力分配不均

由於江澤民缺乏歷史功績，如欲在後鄧時期繼續獨攬總書記、軍委主席、國家主席三項重要職位，勢必會引起其他同輩領導人的不滿。為了鞏固此三項職位，江澤民雖在「十五大」期間積極設法恢復「黨主席」制，由其出任黨主席，由於喬石等人的反對，使其野心破滅。如因江澤民的企圖獲得實現，則其不但可鞏固自己的領導地位，而且可以架空其他六大常委的權力。

三、政策路線分歧

近年中共雖然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略有盡力，但是政改最具關鍵的政權制度化問題，亦即黨權是否願意自我節制以釋放出來社會動力的問題，因事涉根本，未能有所進展。（註12）再從中共黨史發展經驗來看，政策或路線分歧往往與權力鬥爭息息相關，政策或路線爭論只是表象，權力鬥爭才是本質。未來可能導致權力鬥爭的政策或路線爭論主要包括國有企業改革的幅度大小與速度快慢、「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平反與否、以及對美政策或對臺政策的態度強硬與否等。

四、領導人物不和

復以權力如鹽水，愈飲愈渴。中共黨內各個領導人絕不會輕易放棄手中的權力，因為在一黨專制下，擁有權力，就擁有一切；喪失權力，就會喪失一切。

「十五大」閉幕後，未來中共在進行有限度權力鬥爭的過程中，江澤民能否繼續擁有三項重要職位，乃是最值得大家注意的問題。如果繼續擁有，即表示他的權力已鞏固，可繼續領導中共政權到二〇〇二年。如果他只是擔任國家主席或黨主席或只擔任三項職位中的兩項，則表示他的政治權力已被削弱，在有限度權力鬥爭的過程中，軍隊將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由鄧小平安排輔助江澤民接班的劉華清和張震已在中共「十五大」後退出「政治局常委會」及中共「軍委會」，取而代之者為江澤民提拔的張萬年及遲浩田。然二人皆未進入「政治局常委會」，心中是否有些怨言，此現象值得注意。此外，在軍隊中出現的一些現象也值得密切觀察。例如：在提拔軍事將領的過程中，軍隊存在著「紅專對立」的矛盾，亦即具有現代化專業知識者獲得晉升較快，引起只懂馬列主義或毛澤東思想者的不滿。再如，也有人對出身政工的遲浩田擔任「軍委

會」副主席表示不滿。

中共黨內元老在有限度權力鬥爭的過程中也會起一些平衡的作用。換言之，中共黨內元老只要有一口氣在他們的影響力就會繼續存在這是中共的歷史傳統造成的，從第三代集體領導班子在每年春節時向元老拜年（看望）一事可以看得出來。此外，再從制度變革而言，變革僵化的經濟體制已成為後鄧時期的一條不歸路。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遲早會帶動政治體制改革。這也就是說，專制獨裁的共產統治是可以演變的，東歐各國如此，蘇聯如此，假以時日，中共政權也會是如此。根據二月二十三日中央日報報導，北京消息人士透露，江澤民在日前表示，希望未來大陸再穩定五年，以促進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為未來更大的政治改革創造條件。似乎，他已暗示在其權力鞏固後，才有可能大膽地推動政治改革。而一旦江澤民開動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列車，則中國大陸民主化的腳步就有可能邁開。換言之，「和平演變」是中共未來不得不走的道路。所謂「和平演變」並非指中共會喪失統治權，而指中共政權的統治力會逐漸弱化。從市場經濟思想所引發的各種問題可以看出，儘管改革開放取得的一些成就增強了中共對中國大陸的信心，但中共領導人仍然充滿著危機感，擔心自己的統治地位會被推翻。可以說，目前中共領導人的內心處於既充滿自信但卻有危機感的矛盾狀態。之所以如此的主要原因有四（註13）：

(一)是長期以來（尤其是「六四天安門事件」以後），中共領導人始終認為境外敵對勢力仇視社會主義制度，千方百計地妄圖「西化」、「分化」中國大陸，顛覆中共政權。

(二)是在市場經濟思想衝擊下，中共各級黨政領導幹部只重視經濟能否發展的問題，對於所謂「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和政治思想工作，只是虛應故事一番。

(三)是在新、舊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中國大陸社會矛盾增加，政治思想和道德、法制教育相對薄弱，社會文化環境嚴重污染，不安定因素和誘發犯罪的因素相對增加。根據中共的統計，以群眾性抗爭事件為例，一九九五年大陸共發生集會、上訪、攻擊黨政機關事件一一、五〇〇起，參加人數較一九九三年增加百分之十八點八，其中幹部人數增加近四倍。

其他原因還包括：連續發生特大惡性案件，重大刑事案件持續增多；西藏、新疆、內蒙的獨立運動頻仍；基層黨政組織軟弱渙散，社會控制和群眾自衛能力下降；在立法、司法、執法的一些環節，不同程度的制定立法落後，執法不嚴、打擊不力和無力打擊；貧富差距拉大及中共黨員幹部貪污腐化，引起民眾不滿等。根據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五日，中共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聯合發佈一份通知，要求犯有貪污和賄賂等罪的公職人員在兩個半月時間內自首，將予從寬處理。結果，在限定時間內，大陸地區共有三萬六千多人向檢察機關自首，另外有一萬七千餘人分別向各級黨政部門的監察機構自首，類似舉報的案件還有二十四萬三千多宗（註14）。以廣東省為例，在一九八九和一九九〇兩年內查獲貪污或賄賂案件款額在萬元人民幣以上大案者，便有五一〇宗，佔所有經濟犯罪的一半，涉案者有六〇七人（註15）。可見貪污、瀆職之事仍然十分普遍。中共近年來，儘管改革開放帶來經濟成長，但中共領導權威已面臨挑戰。如何穩定政局，已成為中共當局日夜思索的問題。

參、經濟發展之趨向

基本上，鄧後時期大陸的經濟發展，仍將有其政策上的延續性，對於一些經濟方面既定的方針，不太可能會因為鄧小平逝世而發生重大變化，或在經濟上大開倒車。同時，中共在政策上，料將不會有太大的變

動，仍將以經濟發展為第一要務。在經歷三年半的宏觀調整後，於一九九六年取得「軟著陸」的基本成空（註16）。一九九七年大陸經濟的走勢是否會復甦，抑或蕭條衰退，其動向備受關切。因此，如何持續穩定經濟發展，實為當前重要課題。

自一九七八年，中國大陸開始進行改革開放政策，實行社會市場經濟以來，經濟發展已有相當的進展，人民的生活水準亦已日漸提高。在國民生產總值方面，一九七八年大陸只有三千六百億人民幣，一九九〇年增加至一兆八千億人民幣，一九九五年再增加至五兆八千億人民幣。因此，從一九七八年到一九九五年間，大陸的國民生產總值增加了約十五倍之多。在國家財政收入方面，由一九七八年的一千一百億人民幣，增加到一九九五年的六千二百億人民幣，增幅為百分之四百五十，在職工平均工資方面約增加了八倍。此外，亦由於近幾年來，大陸私營經濟和個體經濟的興起與蓬勃發展，凡此皆使大陸人民享受到改革開放與市場經濟發展的成果，因此中國大陸只有進一步的繼續推動改革開放，已難再走向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大陸經濟改革與市場經濟的繼續發展，已然成為全大陸人民的共同期望（註17）。

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已逐漸與世界經濟融為一體，此尤其表現在外資的引進和外貿的發展上。

一、在實際利用外資額方面

從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三年，三年平均每年僅有二十三億美元；從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九年，平均每年增加七十二億美元。一九九五年，大陸實際利用外資額已達四百三十億美元。

二、在對外貿易方面

大陸在一九八〇年的進出口貿易總額，僅有三百八十一億美元；到

了一九九六年，此一金額達到二千九百億美元，約增加了七點六倍（註18）。此外，引進外貿與對外改革開放政策，亦已使沿海省分、經濟特區、經濟技術開發區的經濟大獲發展，如廣東、福建、浙江和江蘇等。這些地方政府由於財力的增加，與經濟的長足進展，絕不願坐視經濟上開倒車。因此，由於外資的利用可為地方政府創匯、增加稅收與財政收入、增加出口、提供就業機會，以及引進先進技術和管理知識，故為大陸未來的經濟繁榮與發展計劃，任何大陸的領導階層都不願破壞此些有利於大陸整體發展的政策。最後，中共亦正積極準備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故使得大陸的經濟改革不可能再開倒車（註19）。

從經濟層面分析，近年來雖然大陸通貨膨脹持續上升，貧富差距加大，失業人口增加。但自中共一九九六年在宏觀調控政策運作下，大陸工業與固定資產投資趨緩，成長率分別達百分之十三與十九左右（註20）。當前大陸工業發展存在的問題，主要是國有企業改革成效不彰、企業生產經營困難，以及經濟效益低落。根據大陸「國家計委」統計資料顯示，大陸國有企業目前擁有七兆多元人民幣的國有資產，但負債已達五兆元（人民幣，下同），負債率高達百分之七十且依然在攀升中（註21）。國有企業虧損惡化亦成為嚴重問題。一九九六年第一季大陸國有企業虧損額（較上半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四十一），超過盈利企業的盈利總額，淨虧損達三十億（註22），是中共政權成立以來所僅見。因為國有企業的改革，牽涉到中共意識形態的存廢問題，近年來雖然中共當局採取信貸和稅制措施挽救國有企業（註23），但成效並不樂觀。此外，經濟結構問題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產業結構，主要是低技術、小規模加工業相對過剩，尤其是傳統產業表現得最為突出、市場競爭能力低下、生產能力利用率不高；二是區域結構，地區之間產業結構趨同，支柱產業選擇雷同之問題突出，產業相似率高達百分之九十四，低水平

重複建設使地區經濟發展失去合理分工效益（註24）。

基本上，大陸經濟發展面臨的挑戰尚包括：農業發展脆弱性與不穩定性，仍可能牽動整體經濟發展。其問題表現在：「一低、一高、一重、一差、一難」，亦即糧食訂購價格偏低、農業生產資料價格較高、農民各種負擔加重（註25）、部分農業政策執行偏差、農產品銷售難（註26）；財政收入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偏低，以及財政赤字偏高與債務負擔重的格局仍難以在短期內改變；在就業方面，根據大陸「民政部」統計，農村剩餘勞動力外移形成的盲流人口已逾一億（註27），每年新增就業人口亦達千萬人，加之一九九六年持續增強國有企業改革力度，且執行宏觀調控政策，因而企業經營困難與倒閉者眾，因而衍生失業、半失業人數劇增，一九九六年估計將達六百五十萬人（註28），此皆會形成日益嚴重的社會與政治問題。此外貿易出口效益與外資利用外資量低落，仍有待積極改善與調整（註29）；所得與地區差距的擴大，亦成為大陸經濟發展的隱憂。

儘管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在經濟行為及其效果上，仍然有其困難與問題存在，但這些因素尚不致於使中國大陸發生動亂。因此，目前江澤民所面臨的最大課題之一，應在於如何繼續維持大陸的經濟成長，否則經濟發展的倒退，將直接衝擊中共內部的權力平衡生態，再一次的引起政治派系之間的鬥爭，進而導致大陸政局的動盪不安。

從兩岸經貿互動來看，在鄧後時期，兩岸經貿投資的交流，仍將持續發展，應不會有太大的實質性影響。例如，由「全國工業總會」所邀請的中共「國臺辦經濟局」局長劉震濤為首的「海峽經濟科技合作中心」訪問團，已如期於三月初訪問臺灣，此顯示兩岸經貿支流不致因鄧小平的去世，而有任何重大的改變。

鄧小平的去世，對兩岸經貿交流或臺商在大陸的投資，最大的影響

可能僅在心理因素方面。由於大陸追求改革開放的政策不變，臺灣方面也一再強調兩岸經貿交流的重要性，因此兩岸經貿實質上的交流，應不會受到太大的衝擊。早在一九九四年，兩岸已互為第四大貿易夥伴。臺資產業已成為大陸吸收境外投資的第二位（註30）。

對於已在大陸投資設廠的臺商，應密切觀察鄧後時期，中國大陸的可能發展形勢，如大陸「經改」政策的可能變化、大陸政局的可能改變，或對兩岸關係的可能影響。對於近期內有可能增資或轉投資計劃的臺商，皆應多加觀察近期大陸政、經的發展趨勢，俟兩岸關係明朗化後，再行定奪。

對於正計畫前往大陸投資，或正欲簽約投資之臺商企業，似應先審慎觀察大陸政、經局勢的可能發展後再行決定，否則徒然增加政治與經濟上的風險。因此在中共「十五」大之後。對於中共未來的政局走向，臺商對大陸的投資仍應以戒急用忍為宜。

就現階段臺商對大陸的投資而言，由於受到鄧小平逝世的衝擊，可能會使一些中小企業暫緩對大陸的投資。自中共對臺展開文攻武嚇以來，根據經濟部「投審會」的統計資料，臺商中小企業赴大陸投資有減緩的趨勢。此主要是因為中小企業者，由於資本額較少，深怕血本無歸，故極易受到在大陸投資的政治風險等心理因素之影響。反觀大型企業由於在投增之前，已把一些有關政、經風險因素皆考慮在內，並做好了各種成本效益評估，因此在近年來兩岸關係降溫之際，臺商赴大陸投資有逐漸轉向大型化的趨勢。此一趨勢，在未來短期間仍將繼續維持下去。

未來中共政局若能持續維持正、經穩定的局面，則兩岸間的經貿投資應不致有太大的變化。事實上，吾人若觀察自一九九五年以來，中共對臺的軍事演習、導彈試射和各種文攻武嚇，皆已影響兩岸間的經貿交流，以及臺商對大陸的投資。因此，在海峽兩岸經貿關係的發展上，政

治和經濟上的因素，事實上是無法分離的。因此中共在「十五大」期間對臺政策若有所變化，或許可能導致兩岸關係的緊張與惡化，此勢將影響及兩岸的經貿交流，以及臺商對大陸的投資（註31）。是故，以兩岸經貿長遠利益來說，未來兩岸經濟合作可望由單一垂直分工結構轉變為多元分工結構（註32）。此一產業合作結構形成的條件，必須兩岸相互提供技術與市場，就長期來看，通過兩岸共同推動的「亞太營運中心」來進行合作（註33），將是對兩岸經貿互動較佳方式。

肆、軍隊的可能動向

就事實而言，中共不僅依靠著解放軍的力量建立了政權，甚至在政權成立後的各項工作，在很大的程度上都是依賴軍隊，是故，每一次的重大事件和變動，都與解放軍有關。軍隊的角色不但是對中共的軍事安全非常重要，對中共政治、經濟也有重要的影響力。尤其，在改革開放後的發展，隨著政治與經濟的發展基調而變動。現今「後鄧時期」中共軍隊的未來動向，是否會持續支持江澤民政權，以及軍隊在政治過渡期是否成為中共政局穩定或不穩定的因素，這些問題值得我們注意。江澤民自一九八九年底接任「總書記」及「中央軍委會主席」以來，的確在軍隊控制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但江澤民出身於技術官僚，與解放軍較無淵源，論及軍事人脈關係也確實較為薄弱。不過，中共政權一向強調「黨指揮槍」，江澤民若能善用黨的資源，使他對軍事控制的穩定因素大過於不穩定因素，則在未來政局發展中，縱使有小股反彈聲浪，恐怕仍無法挑戰江澤民的領導地位（註34）。

首先，就不穩定因素來說，江澤民潛在的不利因素主要有下列幾項：（註35）

一、江澤民在黨的地位問題

目前中共軍事元老李德生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反駁了外界對江澤民無法指揮軍隊的傳聞。他說中共的傳統是黨指揮槍與集體領導，而不是槍指揮黨。鄧小平雖然已經去世，但是「黨的傳統沒有改變」。因此，對於江澤民能否控制軍隊，端視江澤民在黨的地位是否穩固而定。而擺在江澤民眼前的是中共「十五大」後，解放軍代表無一人進入政治局常委，會後雖然解放軍立即表態，擁護江核心，但難保解放軍代表勾連其他政治局常委。此一發展情形，仍待觀察。其次，江澤民在黨內的領導若不穩，而黨內的對手若再勾結軍方反對江澤民，則很有可能對江政權造成嚴重的威脅。

二、江澤民對軍隊之直接控制仍有隱憂

江澤民雖然在一九八九年底即接掌「中央軍委員會」主席及總書記，但國家主席一職是到一九九二年楊尚昆下臺後才接任。換言之，江在一九九二年前的權力並不完整，再加上初掌黨、軍大權尚未進入狀況，因此，對軍隊的控制仍受制於當時的「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楊尚昆。嚴格說來，對一九九三年以來晉陞的將領他才具有完全的決定權。然而，自從一九九四年新修頒訂「軍官服役條例」提出幹部「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要求標準，使晉陞上將者除非任務需要，否則須在六十五歲退職。江澤民一方面提拔將領，另一方面卻又以法律規定屆齡退休，這在鄧小平在世時或許會無異議，但在鄧後的過渡時期，被迫屆齡退役將領是否會因心生不滿而挑起軍隊內部的派系鬥爭，對江澤民的軍事領導地位，也是一項隱憂。

其次，就穩定因素來說，江澤民在七年多的領導過程中，也有一些建樹，這對江澤民的地位具有鞏固的功能。這些因素包括（註36）：

(一)支持軍隊現代化的各項計劃

江澤民上臺以來，即年年支持國防費的大幅提升，迄今，中共已是連續八年以兩位數字的百分比提高國防費用。這其中用於採購及研發高新武器經費，及提高軍人生活費的比例最高。江澤民支持軍隊在武器裝備及生活的現代化計劃，使其普獲廣大解放軍之好感，增強了其在軍隊的領導地位之穩固。

(二)提升將領以「五湖四海」打破派系藩籬

打破舊有野戰軍派系的藩籬是鄧小平一九八〇年代整頓軍隊的主要目的之一，江澤民上臺後，提陞的中將級以上的將領不是打過懲越戰爭著有戰功之優秀幹部，就是在所謂新時期軍事建設理論與實務方面有貢獻者，這種唯才是用，五湖四海作風，可稀釋了軍隊派系的影響力，有助於江澤民對軍隊的控制。

(三)講法治，抓貪腐

江澤民的出身與軍方並無淵源，因此，對軍方控制能夠使得上力的，只有講法治並加強軍隊的法治意識，尤其是對一九九四年頒佈的「軍官服役條例」之遵守，屆齡自然退役，暢通人事管道，消弭軍中派系形成因素。另一方面，江澤民也藉著抓貪腐，整頓軍隊的小金庫，樹立他的領導威望。這些措施現已在軍中廣為宣傳，且逐漸形成一股制約軍隊濫權犯紀的力量，也有助於江澤民日後對軍隊的控制。

(四)將軍隊內部的矛盾轉向國際

從一九九〇年代初起，江澤民即不斷鼓勵軍方高層將領出國訪問，一方面吸收先進國家的國防科技知識，另一方面拓展視野，使軍方將領在思考問題時更具國際觀。迄今，中共對外的軍事交流已不限於俄羅斯，和美、日甚至歐盟之交流也日益密切。這些措施都有助於江澤民把軍隊內部的矛盾轉向國際，從而進行軍隊的改造計劃，有助於他加強對軍隊

的控制。

最後，就前述不穩定與穩定因素相比較，在鄧小平的軍事理論與建軍思想仍被奉為圭臬的未來時期，穩定因素超過不穩定因素。再者，中共軍事元老李德生、葉飛、伍修權、陳錫聯、張愛萍、蕭克、洪學智、呂正操、楊成武、宋任窮、余秋里、廖漢生、王恩茂、王平等人都已表態擁護江澤民。因此，江澤民的軍事領導地位應該是相當穩固的，未來是否有變，則要看中共「十五大」會後，對於江澤民已分配好黨領導職務新職人員滿意度的挑戰而定。無庸置疑地，誠如陸委會副主任委員林中斌教授所言：軍隊是中共權力的支柱。這個權力，不止是向外延長，而是在全國國內到處都有它的影響（註37）。

至於兩岸的軍事關係，在未來到中共「十五大」後，應該會維持穩定狀態。目前，中共對臺策略在內部宣傳上仍然強調這是大陸內部事務，且不排除武力解決。然而，我們也很清楚看到中共在處理臺灣問題的手段上，卻已經國際化。中共國際化處理臺灣問題手段主要有二：

- 1.封鎖臺灣向國外採購高新武器之管道。
- 2.壓制「美日安保」對臺灣安全防衛協助的可能性。

由於這兩項措施需長期培養良好的國際關係，因此，即使鄧小平去世，中共在未來一段時期內，將不致於對臺灣使用武力。

伍、外交政策的取向

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共政權在冷戰世局下成立，自此，中共展開其所謂「社會主義新型外交」（註38），以為其政權存續與壯大的利益服務。基本上，外交政策必然有具體設定的目標，無庸置疑地，四十年來中共政權始終不懈所追求的外交政策目標有三，第一是安全的保障，第二是臺灣回歸祖國，第三則是對外影響力的展現，包括國際地位的提昇

在內（註39）。

事實上，外交政策係依據國家內外環境變化而作適度之調整，同時其最高意旨，乃是確保國家利益與目標達成之必要措施，綜合觀察，中共外交在四十年間變動幅度之大與頻率之繁，實非他國所及；一九四九年中共向蘇聯「一邊倒」，到六〇年代時中、蘇共分裂，一九七二年後轉而同頭號資本主義敵人美國進行「低盪」，至一九八二年後，又開始同蘇聯霸權主義展開和解，國際注目許久的蘇、共高峰會議也已於一九八九年五月舉行。這些轉折堪稱戲劇性；不但對國際構成重大影響，也顯示中共外交政策同其內政發展一樣，具有高度的不穩定性（註40）。

基本而言，中共外交政策實踐與政策向上的劇幅變動，實反映了中共一項最根本，最重大的對外目標抗爭，即在國際體系中尋求扮演一個高度自主的角色；由四十年來中共不同時期的領導人，一再聲言「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共同外交立場，就可得到証實。現今，兩岸在外交上，由於雙方對「一個中國」的版本有所不同；因此兩岸在外交攻防戰也顯得特別激烈（註41）。

後鄧時期中共外交政策上可能發生的變化，可從兩個面向觀察和分析；一是中共外交決策模式，二是中共外交政策取向（註42）。

一、外交決策模式

在外交模式上，進入後鄧小平時期予人關心的一個核心問題是強人是否再具有主導作用，換言之，未來中共外交決策將呈現何種模式風格。從以往的中共經驗瞭解，中共強人一向對重大外交決策起著拍板定案的作用。在毛澤東時期，毛澤東明顯地對中共外交政策取向具有關鍵決策權，例如一九四九年中共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以及一九七二年同「美帝」和解的聯美制蘇政策。鄧小平主政後，中共外交決策明顯展現了鄧

小平的意志：從一九七八年以來，中共在外交上奉行始終是一條反映鄧小平以「經改」開放為中心的務實外交路線，鄧同時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重視客觀現實規律，因此在對外政策上，鄧雖然一再表示循毛的外交遺產（註43），但實際上，中共已不再視既存國際駕構為一極端對立事物，其致力於推動改革與對外開放不遺餘力，此表現在：為引入資金與先進技術，中共不遺餘力同美國及西方國家發展關係，即使一九八九年因「六四事件」遭到美國及西方的經濟制裁，中共仍務實的未割斷同美國和西方的聯繫；此外，為爭取一個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和平安全環境，中共在八〇年代後也同蘇聯和解，並致力同亞太國家改善關係。一般也均認為，鄧小平在不少重大外交決策上起過拍板定案的作用，例如一九七九年元月鄧小平訪美後不久，中共就發動懲越戰爭；東歐及蘇聯發生劇變，亦因鄧小平下達「沉著應變」的指示而使中共未走向孤立，並即承認蘇聯解體的現狀。

然而，在鄧小平紀元下，中共外交決策模式中的強人主導因素事實上已不如毛澤東時代。在毛時代，中共外交決策環境相當封閉，因而毛能夠完全主導決策。但鄧小平時代期，由於改革開放擴大了中共在世界接觸的廣度與深度，涉外事物日益繁雜，並牽動不同勢力的利益，中共外交不可避免受到多元勢力的影響，外交決策情境因此較以往複雜，專業性的外交與經濟部門的官僚明顯對外交決策更具有實質性影響，此種變化導致強人的決策主導作用必然相對性地式微。此外，九〇年代後，鄧小平由於年邁體衰，權力事實上已逐漸移轉至江澤民為核心的領導班子手中。在「六四事件」後崛起的江澤民明顯地資歷、威望不足，因而在九〇年代這幾年，中共的決策體系已日益呈現分散性(fragmented)，因此在外交決策上，江澤民領導地位作用更較以往弱化。在鄧小平病逝後，短期內中國大陸不易出現另一強人，不論江澤民是否能成功地鞏固權位，

中共政治都必然呈現出集體領導的態勢，因此其外交決策體系勢必也進一步呈現分散性，外交經濟部門官僚、沿海省分省籍領導菁英，甚至軍方都可能對外交決策發生影響，這也使得後鄧時期的中共外交決策模式將進一步呈現集體討論和妥協的風格。

二、外交政策取向

鄧小平時期中共的外交政策基本上取決於兩個因素，第一是中共「經改」開放路線是否持續，第二是中共對外來威脅的認知。首先就第一個因素而言，如果中共持續鄧小平時期以發展生產力為優先的改革開放政策，則中共將持續自一九八二年以來具務實傾向的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繼續同美國改善關係，並且全方位地強化同其他地區國家的關係。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中共「總理」趙紫陽訪問非洲十一國，在阿爾及利亞，提出了取代以經援八原則的「中共與非洲經濟合作四原則」，即「平等互利、講求實效、形式多樣、共同發展」（註44），由此不難發現，中共對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將改以加強經濟合作與進出口貿易的方式來彼此互利。此外，中共將對西方所謂國際體制規範也將採取某種程度的融合政策，並傾向通過談判解決各種紛爭。然而，如果中共「經改」開放政策逆轉，或是遭到某種程度的倒退或修正，則可能導致中共對美國及西方的抗拒，或是影響中共目前的務實外交取向作某種程度的修正。

睽諸任何國家的外交政策一方面會受到決策者主觀認知的影響，他方面亦受到國、內外客觀環境的限制。因此探討鄧後中共的外交，亦可由決策者的主觀認知及客觀環境著手。由此兩方面來觀察，鄧後中共的外交亦可能是持續性大於變動性。

首先，就中共決策者而言他們是「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具體言之，主要是中共「政治局」委員，尤其是「常委」們。這些委員在

「十五大」後即會有一些變動，幅度也可能不大。如果他們的言論真正反映其主觀認知，這些人應會繼續支持鄧小平所確立的外交方針。江澤民是鄧小平的接班人，繼續執行鄧的外交政策會有助其權位的鞏固，因而更無意變更之。即使江澤民有意改變之，亦可能無法單獨為之。

其次，由客觀環境觀之，鄧後中共外交亦非常可能是「沒有鄧小平的鄧小平路線」，因為該一路線仍適合中共的需要，亦證明是正確可行的政策。鄧小平路線，簡言之，即為了發展「四化」，中共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江澤民等人一再說明，中共仍是開發中國家，需要一個長期和平的環境以從事建設。中共為此而推動的睦鄰政策已收到了預期的效果。冷戰的結束與蘇聯的瓦解，使得中共在安全上處於前所未有的有利地位，在未來十年內似乎不致受到外來的安全威脅。因此，中共仍將推行全方位和平外交，以便爭取有利的時間，厚植國力（註45）。

陸、兩岸關係之發展

鄧小平死後，預估在政治權力順利接班、改革開放基本路線不致變調或逆轉情況下，中共對臺政策將逐步取得如下五項優勢（註46）：

一、時間上的優勢

在本世紀末前後，在香港主權歸還之後，中共集中全力解決臺灣問題，在民意趨向上具有嚴肅的正當性和必要性。

二、國力上的優勢

由於中共綜合國力明顯地增強，各國基於中共將成為二十一世紀強權的假設，已採取若干有利於中共內政發展的政策，中共因而具有充沛的內部資源和準備，以解決所謂的「臺灣問題」。

三、外交上的優勢

未來中共國際地位逐步上揚，外交資源充沛，與世界主要國家已分別建立起軍事合作和戰略友好關係，中共因而具有充裕的國際資源，對中華民國施加更為緊密的外交壓力。

四、民族主義的優勢

中共近年來在宣傳愛國主義教育和反「臺獨」教育上，相當深入而成功，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取得了其對臺政策的民意後盾。

五、政策整合的優勢

經過多年的測試和運作，中共的對臺政策無論在軟硬兼施和兩手運用等經驗上，都已取得相當的成熟性和共識性。

然而以五項優勢，在落實到實踐層面時，還必須考慮如下三個前提（註47）：

(一)鄧小平生前定下的「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的政策基調，是否仍然能夠用分析、掌握和落實「九七」香港回歸後的兩岸情勢，亦即鄧的對臺政策是否具有延續性和展望性。

(二)江澤民關於「中國統一」的「八項主張」是否能繼續維持，未來是否仍然具有實用性和推廣性。

(三)由於江澤民統領的集體領導班子，對於臺灣問題的意見是否具有同質性和一致性，換言之，江核心的週圍是否存在與江澤民分歧、對立乃至背道而馳的意見足以使江澤民失去全盤統馭對臺政策的立場或實力。

由於中共高層近日決定不為鄧小平建紀念堂，鄧的骨灰將撒在南海和東海海域來看，中共高層顯然對鄧的死亡採取低調處理的態度，這意

味中共高層基於穩定大局的需求，不願意因類似的憑弔活動或「評鄧運動」而引發爭論或騷動。至於骨灰撒於南海和東海，一方面是彌補鄧生前欲前往回歸後的香港而無法如願的遺憾，一方面則是宣示鄧生前的最後遺願：統一臺灣，尚未完成。對此，中共高層應具有高度的共識。

隨著香港主權回收，臺灣問題的重要性將更加浮上臺面。事實上，中共仍會堅持鄧小平「一國兩制」的主張，來面對香港社會，然這一基調能否讓自由慣了香港民眾接受，且「一國兩制」生活方式是一種缺乏歷史經驗及從未經過社會生活檢驗的政治假設。它能否適應於香港，日後應密切觀察。近年來中共利用發展兩岸經貿關係之便，旨在攫取政治利益，因此，中共當前積極強化兩岸經貿關係，一再要求「三通」的逐步實現，帶動臺灣對大陸政策的結構性轉變，在其「以民促官」、「以經濟促政治」的策略運用之下，造成我政府不得不依循其「一國兩制」模式來進行交流，充分暴露中共企圖以經貿為中心，不斷深化臺灣對大陸的依賴，而逐漸開拓一條「有利於祖國和平統一」的途徑（註48）。

一九九五年農曆春節前夕，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發表了以「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為題的長篇談話（註49），針對兩岸關係的發展以及中國統一的問題，提出了八項看法與主張，這篇談話顯示中共未來的對臺政策，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其主要目的，除了鞏固江氏在黨內的領導地位，拉攏海外人心外，最重要的還是江澤民力圖在後鄧時期取得對臺政策的「政策詮釋權」與「工作指導權」（註50）。總括說來，「江八點」在後鄧時期是否具有實用性和推展性，應是觀察兩岸關係的重要指標。此外，隨著改革的深化和利益格局的變動，地方勢力的抬頭，現行中共中央僅知道以行政手段壓制地方（註51）此一做法，只會加深矛盾衝突的擴大，並不能解決該問題，處理不好可能引起分裂。此一趨勢對未來兩岸關係的發展，亦值得吾人留心觀察。此外，

前些時日於陽明山召開修憲會議之結果，對臺灣未來政治格局變化，或多或少牽引著對外政策與大陸政策之步調，這些因素在日後兩岸關係皆扮演其舉足輕重之地位。

柒、評估與展望

依宏觀的角度來看，邁入二十一世紀，世界的趨勢是經濟整合、政治分權。由於科技進步、傳媒發達，文化的壁壘，在二十一世紀之後，也將逐漸模糊，但在未來的數十年以至百年內，主導分合最基本性的因素，不外是種族、血緣、宗教信仰、語言文字，歷史傳統等文化因素。假若文化方面存在著互斥的因素，則原來是「合」的，也不會穩定；反之，原來是「分」的，也會發展出合的關係。促成分合快慢的力量主要是經濟力，如資源、市場、技術、人力等，至於意識型態、法統體制等政治性因素，在一時或許是最有力的、最能影響的，然而從歷史的角度看來，卻是最易改變的。晚近世界各國的變化，皆顯示出這種演變的規律（註52）。

就事實而言，臺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在當代分裂國家中是絕無僅有的特例。現階段在政治上，兩岸主政者都主張以自己的政治信仰和價值觀來追求中國統一。中共領導人認為臺灣人民是自己的「同胞」，理性說來中國人應幫助中國人，才合乎「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之道理。就事實而言，中共從未放棄武力犯臺的念頭，不斷地在國際上全力圍堵與封殺臺灣的生存空間，如李總統訪美後，兩岸關係不確定性因素大幅度增加，致使中共在處理臺灣問題的手段上，以達國際化的層級，也不難嗅出其問題的複雜性。接踵而至舉行一連串「試射導彈」的軍事演習，提升了兩岸之間擦槍走火武裝衝突的可能性，結果雙方將對方列為頭號假想敵，促使原本趨於緩和的關係，突然之間跌入谷底，引起人們的憂

慮，國際間亦密切注視著中共的後續動作。然而，仔細微觀臺海兩岸的統一政策，政治經濟因素佔有相當重要地份量。例如：政府早在「國家統一綱領」中明白表示，經濟才是決定兩岸能否政治整合的關鍵因素。對該問題，中共最高領導人江澤民於一九九四年四月在「對臺工作會議」上表示，「加強兩岸的經濟交流與合作，既可促進兩岸經濟共同發展，又可以增進彼此了解與共識，從而推動兩岸關係的發展與國家統一」（註53）。事實上，中共在明瞭「文攻武嚇」的困難，只得重回江八點「以經貿為主軸」的戰略上，並試圖加強其力量。其主要特色至少有三：

(一)加強吸引臺商進入大陸投資。

(二)推動兩岸三通的進程。

(三)以寬中帶緊的方式穩住臺港關係，基本上屬攻勢。我政府回應策略則大致上依「戒急用忍」的精神而行於三個對臺政策上：

1.對大陸投資的「管大不管小」的區分審核。

2.定點直航與經貿營運特區的策略性調整。

3.依港澳條例支應九七後的情勢，基本上屬守勢（註54）。

從上述兩岸政府的政策宣示看來，兩岸關係的互動發展絕對不能以純政治或經濟的角度去探究，兩岸經貿活動與政治整合目標互為表裏，經濟務實主義與政治民族主義兼而有之，臺灣希望兩岸經濟生活水準差距縮小之後再行統一，而中共則希望經由兩岸的經濟整合來完成政治的整合，其正符合「以商促統」又能完成「產業轉型」，可謂一舉兩得。因此，展望未來互動中應是一個漸進式與有規劃的過程，兩岸關係將進入「協商的時代」（註55），以平等、務實、理性的協商，加強雙方互信、雙贏的局面，實為當前要務。

在可預期的未來，若無重大政治變局，江澤民已成為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核心人物。不過，隨著革命魅力型領袖鄧小平的消逝，中共新領導

階層能否不藉助政治權威，而制度化落實集體領導，並做出有效率的決策則仍有待考驗。事實上，在缺乏絕對權威的專制體系政治運作，以及中央與地方關係與現實政治生態下，勢必會擴大「討價還價」與妥協的空間，以落實政策。此外，儘管在短時間內中共為穩住政治大局，會採取較為保守、穩健的發展取向（註56），依長期發展而論，如果新的領導階層政經發展與改革不能適應急劇的社會變遷，以及著力於深化市場化改革後政經矛盾的化解（註57），尤其是制度化與法制化建設的落實（註58），則後鄧時期大陸情勢的發展仍有難其穩定的局面。因此，展望今後這一年，是兩岸關係最有轉機的時刻，期盼兩岸的領導階層能開啟智慧，存異求同，相互尊重下，重開協商大門，以創建兩岸互動中發展的新方向。

註 釋

註 1：吳玉山、林文程等著，後鄧時期對大陸及臺灣的震盪，初版（台北：國家發展研究文教基金會，民國八十四年四月），第一〇八頁。

註 2：Harry Harding, "On Ther Four Relationships: the Prospects for China," *Survival*(London), Vol.36, NO.2(Summer 1994), pp.22-42.

註 3：吳國光、王兆軍合著，鄧小平之後的中國—解析十個生死攸關的問題，初版（台北：世界書局，一九九四年三月）序言第一項。

註 4：楊開煌，「江澤民政權穩定性之研究方法探討—預測途徑向理解途徑之轉向」。第廿三屆中、日「中日大陸問題」研討會。（台北：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民國八十五年三月廿五～廿七日），第廿一頁。

註 5：楊開煌，「鄧後兩岸關係之分析」。中共研究，第卅一卷第三期。一九九七年三月。第八十頁。

註 6：古德曼(David S.G. Goodman)，西格爾(Geracl Segal)著，溫洽溢譯。鄧後局勢大預測，初版，（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一九九七年二月廿五日），第廿四頁；參閱人民日報（北京），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日第一版。

註 7：趙紫陽的談話，人民日報（海外報），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三日，第一版。

註 8：蘇文敏著，中共十三大與中國改革（北京：北京週報社，一九八七年），第三頁。

註9：同註5。

註10：參閱「後鄧小平期中國大陸情勢」座談會紀錄，中國大陸研究，第四十卷第三期（民國八十六年三月），第七頁。

註11：Ander J. Nathan, "A Faction Model for CCP Politic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53(JAN. Mar. 1973), pp. 34-66.

註12：趙建民，「論中共的政治體制改革」，中國大陸研究（台北），第三十六卷第六期，（民國八十二年六月），第五～二〇頁。

徐尚禮，「北京高層人事底定江、李、喬地位不變」，中國時報（台北），民國八十六年九月八日，第九版。

註13：同註10，第八項。

註14：黃晉。「貪污難肅，廉政無期」，明報月刊。（香港）一九九一年一月。第卅三～卅四頁。

註15：同註14。

註16：人民日報評論員，「了不起的軟著陸」，人民日報（北京），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六日，第一版。

註17：同註10，第十六頁。

註18：「一九九六年全年經濟發展狀況」，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廿五日，第二版。

註19：同註10。

註20：同註18。

註21：「大陸國企業負債達五兆人民幣」，中國時報（台北）。民國八十五年八月十日，第二版。

註22：李正平，「宏觀調控政策全面轉向」。星島日報（香港），一九九六年六月廿九日，第A九版。另據一九九六年一～四月統計資料顯示，獨立核算國有工業企業綜合虧損面為百分之四十

- 三點三，盈虧相抵淨虧損二十五億元。參見：牛文文，「企業改革：已到非常關鍵的時刻」，經濟日報（北京），一九九六年八月五日，第一版。
- 註23：「大陸國有企業虧損持續擴大」，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五年七月八日，第九版；李爽，「發揮中行優勢支持國有企業發展」，中國金融月刊，總四三五期（一九九五年九月），第七頁。
- 註24：邱曉華，「軟著陸後不會出現經濟發熱」，明報，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廿六日，第A十一版；蕭瑞，「經濟結構急需改善」，大公報（香港），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四日，第C四版。
- 註25：「湖南數萬農民暴動」，聯合報（台北），民國八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第九版；「認真做好減輕農民負擔工作」，人民日報（北京），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九日，第二版。
- 註26：農業部農研中心綜合室，「一九九五年農村經濟形勢和一九九六年趨勢」，經濟研究資料，一九九六年第二期（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日），頁七。
- 註27：「大陸盲流破億」，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廿四日，第九版；周野，「大陸逾億失業人，不知何日見春陽」，中國時報，民國八十六年一月四日，第九版。
- 註28：「九七經濟增長率是百分之八」，明報，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一日，第A十版；「一九九六年全年經濟發展狀況」，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廿五日，第二版。
- 註29：李福鐘，「『政治年』的大陸經濟」。聯合報，民國八十六年一月三日，第九版；「積極推進兩個轉變，加大結構調整力度」，人民日報（北京），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九日，第一版。
- 註30：吳儀，「發展兩岸經貿，造福中華民族—歡迎臺灣經貿主管負

責人以適當身分來訪」，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九五年二月十七日，第五版。

註31：同註10，第十七頁。

註32：婁長洪，「論海峽兩岸產業向多元化分工結構躍進」。一九九五年二月十六日，北京，「海峽兩岸產業合作學術討論會」論文。

註33：劉長慶，「兩岸產業合作與發展的前景—從臺灣產業升級走向來看」，一九九五年二月十六日，北京「海峽兩岸產業合作學術研討會」論文。

註34：同註10，第十三頁。

註35：同註10。參閱陸家，中共「十五大」標誌向舊體制告別，中國時報（台北），民國八十六年九月廿日，第九版。

註36：同註10，第十四頁。

註37：何頻，鄧小平之後的中國，初版。（台北：新新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九四年四月）第七〇頁。

註38：婁光章，張光幼為中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所撰之「新中國外交的創建與基本政策—第一部分」，中共廣播輯要，國防軍事情報局，民國七十八年一月五日。

註39：張煥卿、段家鋒等著，中國大陸研究，初版（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八十年十二月），第三九二頁。參閱Harod C. Hinton, Communist China in word Polictics(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66), pp.107-118; Setven J. Rosen & Walter S. Jones, The Logic of internation Relation(Cambridge: Winthrop Publishers, Inc, 1980), p.123.

註40：同註39，第三九三頁。

註41：郭岳，兩岸關係展望，（台北：永然文化出版社，民國八十二年六月），第一〇一頁。

註42：同註10，第廿頁。

註43：鄧小平對毛澤東外交遺產的接收，包括：自力更生政策，支持第三世界反殖，反帝的鬥爭，強調「三個世界」理論仍有效，反對超強從事核子軍備競賽、呼籲裁軍等方面。同註39。

註44：「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編輯室主編，中國外交概覽，（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第五五頁。

註45：同註10，第廿二頁。

註46：同前註，第廿三頁。

註47：同前註。

註48：郭瑞華，「江八點—新春對臺八點講話分析」，共黨問題研究，第廿一卷第三期，民國八十四年三月十五日，第六頁。

註49：「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九五年一月卅一日，第一版。

註50：宋國誠，「江八點與後鄧時期的兩岸關係」，中國大陸研究，第卅八卷第五期，民國八十四年五月。第五～七頁。

註51：蘇紹智，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的再認識，（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民國八十四年八月），第二五三頁。

註52：耶魯兩岸學會編，邁向廿一世紀的兩岸關係，初版，（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廿五日），第七頁。

註53：「中共視對臺經濟為兩岸統一基礎」，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三年四月十六日，第七版。

註54：顏建發，「冷中帶熱的兩岸經貿互動」，中央日報，民國八十六年五月二日，第七版。

註55：張濤、金千里合著，江八點的迷惑，二版。（台北：瑞興圖書有限公司，民國八十四年八月），第一頁。

註56：Matt Forney, "Propaganda Man," *Far Economic Review*, Vol. 159, no. 49 (Dec. 5, 1996), pp. 20-22.

註57：鄭京平，「鄧小平留下的政治遺產和江澤民的接班時機」，聯合早報（新加坡），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二日，第十九版。

註58：Seth Faison, "Shanghai's Aspiration Hit Reality,"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DEC. 14, 1996, p. 11, 15; Philip Taubman, "Chinese Schizophrenia," *New York Times*, nov. 19, 1995, p. 14.

參考書籍

一、中文部份

(一)書籍：

- 1.「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外交史編輯室主編。中國外交概覽。北平：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 2.古德曼(David S.G. Goodman)，西格爾(Geracl Segal)著，溫洽溢譯。鄧後局勢大預測，初版。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一九九七年二月廿五日。
- 3.何頻。鄧小平之後的中國，初版。台北：新新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九四年四月。
- 4.吳玉山、林文程等編。後鄧時期對大陸及臺灣的震盪，初版。台北：國家發展研究文教基金會，民國八十四年四月。
- 5.吳國光、王兆軍合著。鄧小平之後的中國—解析十個生死攸關的問題，初版。台北：世界書局，一九九四年三月。
- 6.郭岳。兩岸關係展望。台北：永然文化出版社，民國八十二年六月。
- 7.耶魯兩岸學會編。邁向廿一世紀的兩岸關係，初版。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廿五日。
- 8.張煥卿、段家鋒等編。中國大陸研究，初版。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八十年十二月。
- 9.張濤，金千里合著。江八點的迷惑，二版。台北：瑞興圖書有限公司，民國八十四年八月。
- 10.蘇文敏。中共十三大與中國改革。北京：北京週報社，一九八七年。
- 11.蘇紹智。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的再認識。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民國

八十四年八月。

(二)期刊論文：

12. 李爽。「發揮中行優勢支持國有企業發展」。中國金融月刊，總四三五期。一九九五年九月。第七頁。
13. 宋國誠。「江八點與後鄧時期的兩岸關係」。中國大陸研究，第卅八卷第五期。民國八十四年五月。第五～七頁。
14. 郭瑞華。「江八點—新春對臺八點講話分析」。共黨問題研究，第廿一卷第三期。民國八十四年三月十五日。第六頁。
15. 「後鄧小平時期中國大陸情勢」座談記者會紀錄。中國大陸研究，第四十卷第三期。民國八十六年三月。第七頁。
16. 黃晉。「貪污難肅，廉政無期」。明報月刊。一九九一年一月。第卅三～卅四頁。
17. 農業部農研中心綜合室。「一九九五年農村經濟形勢和一九九六年趨勢」，經濟研究，一九九六年第二期。一九九六年二月廿日。第七頁。
18. 斐長洪。「論海峽兩岸產業向多元化分工結構躍進」。海峽兩岸產業合作學術討論會論文。一九九五年二月十六日。
19. 楊開煌。「後鄧兩岸關係之分析」。中共研究，第卅一卷第三期。一九九七年三月。第八十頁。
20. 楊開煌。「江澤民政權穩定性之研究方法探討—預測途徑向理解途徑之轉向」。第廿三屆中、日「中日大陸問題」研討會。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民國八十五年三月廿五～廿七日。第廿一頁。
21. 趙建民。「論中共的政治體制改革」。中國大陸研究，第卅六卷第六期。民國八十二年六月。第五～廿頁。

(三)報紙：

22. 「一九九六年全年經濟發展狀況」。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廿五日，第二版。
 23. 人民日報評論員。「了不起的軟著陸」。人民日報。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六日，第一版。
 24. 「大陸國企業負債達五兆人民幣」。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五年八月十八日，第二版。
 25. 「大陸國有企業虧損持續擴大」。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五年七月八日，第九版。
 26. 「大陸盲流破億」。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廿四日，第九版。
 27. 「中共視對臺經濟為兩岸統一基礎」。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三年四月十六日，第一版。
 28. 「九七經濟增長率是百分之八」。明報。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一日，第A十版。
 29. 朱文文。「企業改革：已到非常關鍵的時刻」。經濟日報。一九九六年八月五日，第一版。
 30. 李正平。「宏觀調控政策全面轉向」。星島日報（香港）。一九九六年六月廿九日，第A九版。
 31. 李福鐘。「『政治年』的大陸經濟」。聯合報。民國八十六年一月三日，第九版。
 32. 邱曉華。「軟著陸後不會出現經濟發熱」，明報。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廿六日，第A十一版。
 33. 吳儀。「發展兩岸經貿，造福中華民族—歡迎臺灣經貿主管負責人以適當身份來訪」，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九五年二月十七日，第五版。
-

- 34.周野。「大陸逾億失業人，不知何日見春陽」。中國時報。民國八十六年一月四日，第九版。
- 35.「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九五年一月卅一日，第一版。
- 36.徐尚禮。「北京高層人事底定江、李、喬地位不變」。中國時報。民國八十六年九月八日，第九版。
- 37.陸家。「中共「十五大」標誌向舊體制告別」。中國時報，民國八十六年九月廿日，第九版。
- 38.「湖南數萬農民暴動」。聯合報（台北），民國八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第九版。
- 39.「認真做好減輕農民負擔工作」。人民日報（北京）。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九日，第二版。
- 40.鄭京平。「鄧小平留下的政治遺產民和江澤民的接班時機」。聯合早報（新加坡）。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二日，第十九版。
- 41.「積極推進兩個轉變，加大結構調整力度」。人民日報（北京）。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九日，第一版。
- 42.顏建發。「冷中帶熱的兩岸經貿互動」。中央日報。民國八十六年五月二日，第七版。
- 43.斐光章、張光幼編。「新中國外交創建與基本政策—第一部分」。中共廣播輯要。國防軍事情報局，民國七十八年一月五日。

二、英文部分：

(一)Book

44. Harold C. Hinton, *Communist China in word Politic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96), pp.107-118.
45. Setven J. Rosem. & Walter S. Jones, *The Logic of internation Relation*

(Cambridge: Winthrop Publishers, Inc, 1980), p.123.

(二)Periodicals

46. Ander J. Nathan, "A Faction Model for CCP Politics," *The China Quarterly*, no.53(JAN. Mar. 1973), pp.34-66.
47. Harry Harding, "On The Four Relationships: the Prospects for China," *Survival*(London), Vol.36, NO.2(Summer 1994), pp.22-42.
48. Matt Forney, "Propaganda Man," *Far Economic Review*, Vol.159, no.49(Dec. 5, 1996), pp.20-22. Thomas L. Friedman, "China's The Game." *New York Times*, Dec. 18, 1966, p.A27.
49. Seth Faison, "Shanghai's Aspiration Hit Reality,"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Dec. 14, 1996, p.11,15; Philip Taubman, "Chinese Schizophrenia," *New York Times*, nov.19, 1995, p.14.